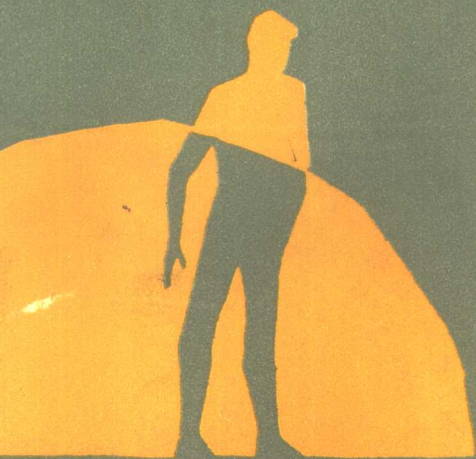




李 泊

起步



起 步

李 泊

内 容 说 明

十年内乱，教育战线是一个重灾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科学文化，不能不激起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抗，《起步》就是通过几个大学生之间的爱情和友谊、聚合与离散为主要线索，形象地再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塑造了王南生、韩正娟等生动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一代青年在迷雾和风浪中奋进，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们对生活、对真理的严肃追求；此外，风派干部赵金海、政治小丑万洪亮，以及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的黎小倩，也各具鲜明的性格特征。

起 步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1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1}{2}$ 插页 2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2,000

书号 10019·3561

定价 1.30 元

第一章

初春的清晨，天空开始明亮起来。在令人身心为之爽快的晨风里，王南生镇定地坐在一辆奔驰的出租客运三轮摩托车里。他尽量使自己体味着心中的欣喜之情，享受着即将实现命运转变的前夕所特有的兴奋。

他把热烘烘的充满生命力的面孔挨近车篷的小窗，让风痛快地吹着。他深情地浏览着长安街上开始忙碌起来的人影和一幢幢熟悉而又显得陌生的建筑。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还是那样肃穆、开阔。当王南生看到天安门朱红色的城墙时，他真切地感到他确实又一次回到北京了，而且很可能要相当长久的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新的生活在召唤他，生活的无穷魅力在那样强烈地吸引着他，使他不由得发出了甜美的微笑。

摩托车驾驶员和王南生一样年青，王南生觉得他恐怕比自己还小几岁。从他在北京站行李房帮王南生找行李的举止言谈中，王南生断定他是出身于工人或市民家庭的。因为他说话的腔调带着老北京人所特有的味道，并且具有从

小养成的惯于做一切具体事务，能很自然地待人接物的本事。

大概是年青的驾驶员觉得他的乘客一身东北打扮，又携带着知识青年应有的一切：一只大帆布箱、一大捆行李、一个大手提包和一个塞得不能再满的大书包，就仄过头向身后的王南生问：“你是下乡知识青年吗？”

“啊，是。”王南生用欢迎提问的声调回答。

“你回北京了？”问话带有祝贺的意思。

“啊，是。从黑龙江回来。”王南生降低了回答的声音，以免给对方留下他为离开东北农村而庆幸的印象。

“黑龙江！够远的，大北边儿了。”驾驶员感慨地说，“那你是回来上大学的吗？”他准确地判断了他的乘客。

“是，是回来上学的。”这是王南生非常乐于承认的，但是他有意让他的语气随便，以不使对方把他看成是以能上大学而洋洋自得的庸人。这是他从报名上学，特别是接到入学通知之后一再提醒自己注意的。

驾驶员敏锐地感觉到了他的乘客的谦逊和谨慎，于是友好地问：“是哪个大学？”

“师范大学。”

“学什么？”

“政治。”

车在六部口的红灯下稍停片刻，又嘟嘟地向前开动了。挂上三档以后，驾驶员开口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完大学都怎么分配？”

“原则上恐怕是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过，师大的学生毕业以后可能分在北京。招生的老师这么说。这个学校主要是为北京培养师资，招的学生，家都在北京。”王南生说。

“那你不错，算回家了。”驾驶员毫不隐讳他对生活的要求。

“是的，他是不愿意远离家庭去上山下乡的那种人，他已经有了固定职业，而且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说话。”王南生想道，又补充说：“不过也没准儿，留不留在北京，还要看三年毕业以后的形势变化。再回黑龙江或分配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也有。”

王南生的话显然触动了驾驶员的感情，他有些激动，使劲儿加大油门同时提高嗓音说：“这些年，什么都没准儿，一会儿一个政策，过三年指不定怎么着了呢。”

他们没有再说下去。三轮摩托拐进了胡同，速度依然很快。驾驶员盯着前方，熟练地操纵着方向把，时而开一下车灯，时而按动尖声的喇叭。

车停在王南生家门对面。年青的司机帮他把箱子、行李搬下车，收了费，开了条，对正感谢他的王南生很快地挥挥手，说声“不客气”，便敏捷地戴上油污的白线手套，开车走了。

王南生站在家门口的石台阶上，直到看着三轮摩托红色尾灯的光亮消逝在胡同的转弯处，才伸手按了两下褪了色的红漆门框上的电铃。他看了一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是六点半钟。“妈妈也许还没起床吧。”他想。

听得出，门洞里传来的轻轻的急切脚步声，是田阿姨的。当门缝里传出“谁呀？”的问话时，王南生立即亲切地回答：“是我，阿姨。”

田阿姨也听出了王南生的声音，高兴地扭开撞锁，拉开大门，迎着王南生微笑着，“是早晨车刚到的吧。”并不等回答就帮他拿箱子，搬行李。她知道他这个时候要回来，这几年王南生回家都是坐的这趟火车。

田阿姨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身体很好。王南生对她充满敬意和亲切的感情，因为她把半生的精力和年华都奉献给了他的家庭。她带大了他兄妹三人，把她的幸福和命运都和他的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帮王南生把东西安置在他的房间里之后，田阿姨捋起她灰白的头发，对高出她一头半的南生说：“你把要洗的东西都甩出来。你妈就起来了，你去看她去吧，电报来了，她老在念叨你今天回来。我去给你做饭啊。”她欢喜的噙噙地去厨房了。

站在一面全是玻璃窗的走廊里，南生没有急于敲妈妈的房门。他凝神望着他曾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幽静的院落。房屋由于多年没有修缮粉刷，显得旧了些。但由于质量好，依然给人以沉静、舒适的感觉。自从六八年离开这里去黑龙江，虽然几次回家探亲，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再在这个院子里长住。

这个院子里的一切，王南生是那样熟悉：那棵已经返青的丁香树，是他反复爬过无数次的；那条在当年那么好的隐

蔽了他的幼小身体，使他用汽枪打中了生平第一只麻雀的二门槛，现在已经变得那么矮小了；那曾经是牢固的结实的用方木钉成的葡萄架，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歪倒向一边；还有那东院邻家长过房顶的大枣树，那上面的枣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最香、最脆的枣。他清楚地记得他偷吃那大枣时的紧张、慌乱和贪婪的情景。

“啊，过得真快。”他兴奋地想，“已经二十一岁了，是該到了打开走向生活的一扇大门的时刻了。”

王南生的妈妈李玉，是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的干部，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肝功能不大好，从部里在湖北的干校回北京来治病。虽然，干校的领导很不高興让她回物质条件优裕的北京的家里养病，回来的路费也完全要自付，但是她终究还是回来了。

李玉是在干校知道小儿子被推荐上大学的。她一接到王南生的信，就立刻兴冲冲地找到同在于校的老头子王国栋，把这消息告诉他。她表示，儿子上大学是好事，回北京更是好事，美中不足的是上师范。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定不同意儿子进这样的学校。现在，只好如此，因为她知道还有多少人的子女没有获得儿子这样的机会呢。

老头子却不象李玉那样看这件事。他仔细地看过南生匆忙写成的信之后，脸上难得地显露了一丝舒展的微笑。他只说：“农村里贫下中农推荐他到大学学习，是给他很珍贵的学习机会。”就把信交还给了李玉，意味深长地、责备地在

爱人身上扫射了一眼，又去给贪吃的肥猪添加饲料了。

王老头子对子女的态度，李玉是不满意的。前些时，好多人家都利用熟人的关系把孩子弄到部队或弄回北京进工厂了。她去找他商量把南生从东北农村弄回北京，他却象责备她又象自言自语地说：“不好这样做吧。”还说：“南生在农村里表现还是不错的。”结果，等走后门的事情在社会上反应大了，引起老百姓不满了，南生的事情也不好再提了。

从心里说，李玉对她的三个孩子都是喜爱的、没偏没向的。大儿子军生，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生的，毕业于工业大学，现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老二南生，是在南方局工作的时候生的。老三平生，是她的宝贝女儿，调到北京工作以后生的。她在北京的一家机床厂当工人，今年也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电子计算机。每当李玉想到她的三个聪明、正派而且都长得好的儿女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超乎一般母亲的自豪。这种自豪不仅在平时使她感到欣慰和满足，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头子和她都受到最严酷的斗争的时刻，也使她顽强地相信未来，勇敢地为丈夫、为自己，更是为子女承担了一切打击。

李玉在喜爱她的子女的同时，也象其他做母亲的家长一样，爱拿别人的子女做自己子女的比较对象。不过她不是出于自私的偏心去比较的。每当这种比较结束之后，她总能发现她的子女身上有一种独立的人格和进取的姿态。她十分高兴她的发现。她虽然说不清楚儿女们的这些特质是怎样被赋予的，但是她相信，她和老头子的存在肯定是

起到了好的作用的。最近，当她听说有个局长的几个女儿，都是没有结婚就大肚子了，就在心里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连家里的孩子都教育不了，还怎么干得好党的工作？还怎么叫共产党！”

南生要求到东北去，是在李玉经过了同丈夫共同的巨大考验之后的事情。这是她毫无精神准备的。在她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后，一切都会转入正常的，南生应当走军生的道路，平生也该走她两个哥哥的道路。然而尽管她在内心里是这样给她的孩子们安排命运的，但她仍然感到事实不能违拗。南生坚决要走，决心很大。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李玉找不到能够阻拦的理由，只好在匆促中为儿子收拾了行装。只是她相信，儿子不会一去不复返的。为了弥补这个家庭的第一次分裂，在送南生上路的早晨，李玉把背着丈夫从银行取出来的一千块钱悄悄塞给他。她现在仍旧清楚地记得儿子拿着那些钱的疑惑的稚气的眼光。那时他的上唇上才刚刚生出男性的黑绒绒的胡子。

干校生活虽然没有使李玉从根本上改变对现实的看法，但却使她对南生正在走的道路有所理解了。男孩子到社会上独立地闯一闯，走一些弯路，吃一些苦头，锻炼锻炼，能体验到老百姓的生活，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思想成长有好处。为了这些好处，忍受家庭的暂时分裂是值得的。况且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不想忍受家庭的分裂也不现实，不仅南生分裂出去了，连她和丈夫也不得不和军生、平生再次

分裂。现在，分裂是被重视的，团聚是被蔑视的。她就是在被蔑视中自费回北京来同她的子女们团聚的。回来看肝病，不过是人们都惯于采用的回北京的借口之一罢了。

面对披衣站在眼前的显得又矮又瘦的李玉，南生低声的呼唤了一声：“妈妈。”他的眼睛湿润了。因为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明显的走向衰老，而自从母体中分离出来之后，他第一次感到他的生长正在抵制着他的母体的生长。他心中感到了难忍的怜悯和同情。他把身子俯向他的母亲，仔细地打量着她，一种人类亲爱的本能一下子打破了这个家庭多年来的习惯——家庭成员间没有握手，更没有比握手更热烈的感情交流方式，他伸出臂膀，拥住了母亲的双肩，用他的生气勃勃的眼睛盯视着母亲兴奋的眼睛。他又轻声叫了一声：“妈！”

“这几天在火车上没睡好觉吧。”母亲在儿子的拥扶下说。她的眼睛在贪婪地慈爱地寻找着儿子身上更多的变化。正象母羊走失了她所哺乳过的嫩稚的心爱的羊羔，在过了若干时光之后，又看到她的充分发育起来的小羊带着雄壮的犄角再现在她的眼前，朝她轻声咩叫的情形那样。

王南生感受到了母亲的这种感情，在母亲的顾盼下羞怯而不安。他向母亲请求：“妈妈，你别老看我，我和以前不是一样吗。”

“变得多了，又高了，是个大人的样子了，就是还那么瘦呢。”她说。“回来多吃些好东西，把身体养好。”

“那我可什么病都没有。有也就是感冒发烧。”王南生让妈妈在沙发里坐下之后，坐在她的身旁说。

“你还是一感冒就发烧的吧，一烧烧得那么高，怕人得很。”妈妈老是忘不了南生小时候高烧不退的情景。

“现在能控制了，一觉得要发烧我就把 A. P. C. 和土霉素合起来吃，效果特好，而且农村这两种药都不太难买。”他调整了一下姿势，把他的腿舒服地伸展开，又问妈妈：“你回来这些天去查肝功能了吗？”王南生和他的兄妹对父母都是用“你”来称呼的，用“您”在他们的感觉里是客气的和疏远的。

“去人民医院查血了，转氨酶一百七十几，那个小大夫挺好的，开了四十天的假，然后再看。”

南生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医生和部分病人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靠了这种默契，不少人躲过了猛烈的政治风浪，获得了好处。他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舒口气说：“现在，咱们家除了老头儿，都回来了。看来咱家比别人家的命运要好一点儿。”

李玉知道儿子所说的“好一点儿”是指那些在运动里被拆散而不能重圆或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的家庭。她突然感到政治的无情和光阴的有限，阴沉下了脸。她很快地对南生说：“平生的学校昨天已经开学了，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赶快到学校去报到吧。”仿佛他明天不去就会失掉入学资格似的。

“我才不着急呢，大后天报到也不晚。平生她们学校都

擢了好几届生了，我们学校去年才招生，我们系今年是头一届，去年都没招生。”南生说。他给妈妈往干校写信的时候，这些有关学校的详细情况他还不知道。

“啊，是不用着急，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总以为你还是要回去的。”妈妈对身旁实实在在舒坦地靠着沙发的儿子微笑了。“我去给你看看饭，吃完饭洗个澡，好好睡睡。昨天我告诉阿姨给你烧水的。”她站起身，又看一下儿子，就到厨房去了。

王南生没有向妈妈说几年以后“没准儿”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他不想在这个时候伤妈妈的心。

吃过了可口的放了香油的富强粉味精挂面和两面煎得焦黄的鸡蛋，王南生在澡盆里彻底地洗涤了他的身体，在妈妈的柔软的床上甜甜的睡去了。

直到黄昏时分他才醒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明白他的处境，从床上跳下来，回到他的房间去了。王南生很可惜用了整整一个白天睡觉。原先他打算顶多睡到午饭之前就起来，然后把一切带回来的东西都整理好，安排好报到之前这两天的行动计划。他还有一件顶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从接到入学通知书之后这些天一直要做，但是被离别的种种琐事一次次干扰而没有做成的事情。那就是，系统地清理他的思想，估价他的实际情况，预计新的生活，使他具有完全清醒的头脑，从而获得自信的力量。没有这清理，他简直感到寸步难行。

吃晚饭前进行他的清理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整理东西什物，安排好这两天的行动计划还来得及。于是王南生就动手干起来。

他把他的东西什物分成两类，一类是准备带到学校去的，一类是留在家里的。带到学校去的是他的东西的精华部分，为的是用起来方便、顺手。同时他也注意到，带到学校的东西一定不要给人留下奢华的印象，应当尽量朴实。他把准备带走的東西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信，他再找不出什么具有享受性质的东西了。

收拾好了东西，王南生坐在桌前，打开他的笔记本，把别人托他在北京办事的记录看了一遍，又想好了几个必须去拜访的人，计算一下时间，两天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别人托办的事，不管是否办得成，都要抓紧时间办，并且要尽快得到结果。这样既是为了解除上学的后顾之忧，也是为了不让别人指摘他怠慢，使他的良心受到责备。在这一原则下，拜访的时间必须大大压缩，能用写信或电话代替的就尽量代替。

只有一家王南生无论如何必须亲自去的，那就是他的小学老师俞淑秀家。俞老师当王南生的班主任是在他上四年级的时候。由于她对学生的爱，特别是对顽皮的已经成了集体的害群之马的王南生的细致入微的爱，使他一下子转变成了懂事的听话的三好学生，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成了全校的尖子，并且以双百分考入了当时那么被众人仰慕的男四中。王南生一直认为，没有俞老师当年的爱就不会

有今天的他，俞老师是对他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这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过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的。他热爱和尊敬俞老师，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狂热的信奉“血统论”的那个极端的短暂的时期里，他也没有从心目中把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她抹掉。当他试图去抹掉以使他的全部身心和“血统论”相一致的时候，他感到的是痛苦和不安，因为热爱和尊敬一个心地善良的象母亲那样的女人，和他的良心是一致的。

吃过晚饭之后，王南生终于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在柔和的台灯光线里开始了他的清理。

他有几本记载着他过去历史的日记，他慢慢地翻看着它们。他的积极和进步，标志着他政治觉醒的入团，他的造反、大串联、上山下乡……一切，都象是在昨天。转眼，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青年，又要面临一个新的陌生世界。

面对这个新世界，王南生首先被他的还年青感动。他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不希望生命逝去得太快，他只愿意生命在有意义的环境中度过，如果周围的一切都是无益的，他的生命就应该停下来，等待有益的环境到来，然后让生命重新开始。他很高兴，当代青年所该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了，并且是以认真的态度经历的，他没有浪费生命。现在，他没有浪费的生命给他的今后留下了什么可以依恃的呢？一个，是还年青的、还可以经历许多有意义的生活的生命；这属于他支配的生命，他才用去了很小的一部分。再一个，是他过去生命留下的历史，他满意他的历史；尽管那是有过过失

的、曾经盲目乱闯的历史，但那历史是有追求的、是不断要求进步的。

“过去是有意义的，未来就必定美好。”王南生充满自信地对自己说。他真切地感到了他对新的大学生活的渴望，他觉得在这渴望中他的身心在成熟。

“我要冷静、坚定，学习更多的知识和理论，为未来掌握更多的武器。我要在政治上更快地成长起来，力争早日加入党组织。”王南生在心里这样要求着自己。对学习，他觉得完成自己的目标他是有把握的；对入党，他不知怎么，觉得自己应该那样，因为在以往的经历和他所接触过的人当中，他是顺利的也是先进的。不过这回他想让自己保守一点，他把自己入党的时间估计在三年大学生活的第二年的后半学期。他想到那时也许就是他最成熟的时候了，而且那时不显得仓促，也不显得落后，那是个稳妥的时间。王南生为他的自我入党的安排微微地笑了。

二

大学生活的头一天是忙乱的。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王南生只办成了这样几件事：报到，填写学生卡片，领学生证、借书证、饭票，转团的组织关系和把行李安置在宿舍里。要是在以往，对这种低效劳动，他早就骂街了。但现在是在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里，一切都是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的，这使他整天都处在兴奋之中。

和王南生同宿舍的是京郊农村来的万洪亮，建设兵团来的吴志强。万洪亮有一副强壮的身体和一张又方又圆的难看的脸，身上散发着浓烈的直逼人面的男子汉气味。他的握手使王南生的纤细的手很疼，王南生多少感觉到他是在显示他的身体和力气，显示他的出身。

吴志强要比王南生矮半头，他不象万洪亮那么强壮，但骨骼很发达，魁伟的身材和他颧骨高高的四方脸协调一致地表现出他的早熟。他比王南生小两岁，才过完十九岁的生日不久，但看上去王南生比他更接近于少年。他和王南生的握手也很用力，但却是有分寸的。握手时他用聪明的眼睛打量着王南生的神情，给王南生留下很深的印象。看到那神情，王南生马上闪现出这样一个判断：社会造就了一个精明的人。他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感到奇怪。

万洪亮和吴志强比王南生先进到这间临近二楼楼梯的宿舍，但是他们没有占用那位置最好的床位，把它留给了最后来的同伴。王南生很满意在新环境里这种相互关心体谅的同志关系。

“你们俩谁睡不好觉搬到这儿来吧，我睡门口就行，我不怕吵。”王南生对握过手就帮他打开行李的两个同学说。

“你就睡这儿吧，这是没办法的，谁让你是最后来的呢。”吴志强假装抱怨似的说。

“这是最难以反驳的了。”王南生对有幽默感的新同学的劝说一时找不到一句相应的具有同样幽默感的回答。象一切内向而不善于词令的人一样，他只是感谢地微笑着看